

# 清华新闻传播学

## 前沿讲座录

李彬 尹丽娟 杨芳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 PREFACE

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

## 写在前面

李彬

自2001年以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直坚持为每届研究生开设一门高层次、前沿性、学术化的通选课——“新闻与传播前沿讲座”。承蒙学界与业界的关心与支持,几年来这个讲坛有幸邀请到不少海内外知名人士与大家高手。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纵论新闻传播领域的“高精尖”话题,内容宏富,眼界开阔,思想精深,观点鲜活,令人每每为之击节叹赏。

遗憾的是,这些精彩讲座虽在青年学子心头一次次激起思想涟漪,仿佛“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是许多讲座也如风过耳一般,讲过之后往往便销声匿迹,无法形成一种“可持续”的效应。尽管有些讲座也曾做过录音整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不了了之。对此,我们一方面感到愧疚,另一方面也不胜惋惜。有鉴于此,本学年开课之初,我们就有意做出安排,不仅按照统一的主题精心组织每讲的内容和人选,而且每次讲座都由研究生认真记录和整理,最后再经过统一编辑,遂形成这部书稿——《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

此次前沿讲座的主题是“中国社会与大众传播”,也就是希望结合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剖析新闻传播的尖端问题与前沿话题,其中尤其注重体现国情意识。另外,我们在致各位演讲者的邀请函里,还提到两点希望:“希望本次讲座能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同时,希望最好能将前沿性、思想性和通俗性有机结合起来。”由于各路大家的响应和配合,这些预期的目标和设想基本实现,而且如同以往历次开课的情形,每有精彩纷呈,时见高潮迭起。

大致说来,此次前沿讲座的内容可分四类。第一类涉及新闻传播、新闻记者、新闻工作等,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的第一讲《中国国情与新闻传播》,《中国青年报》副社长、副总编辑陈小川的《今天的新闻传媒》,新华社高级记者、《穆青传》作者张严平的《我心中的穆青与新华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的《我国传媒的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等。

第二类关乎当下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一大热点——产业与经营,如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的《社会变迁与广播电视产业的转型》,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张海潮的《中国电视的数字化产业化生存》,《中国妇女报》总编辑卢小飞的《媒体的盈利模式与改革探索》,新华社对外部主任、原《上海证券报》社长严文斌的《财经媒体的竞争策略》,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刘建生的《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和思考——以出版产业为例》,《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侯军的《党报营销“三部曲”》等。

第三类主要讨论专精而高深的学理与学术,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潘忠党的《新闻架构研究的兴起与误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祝建华的《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等。

第四类则属于跨学科的相关讨论,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三农”问题的背景》,中国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张文木的《论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能力》,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格非的《大众传媒时代的写作》等。

这些讲座不仅带来许多新鲜的思想,而且触发许多活跃的思考。相信通过这部讲录,这些思想与思考会在更多的人心头激起火花,而这也正是这个系列讲座以及这部讲录的意义所在。

# CONTENTS

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

## 目 录

- 1 第一讲 中国国情与新闻传播 / 范敬宜
- 13 第二讲 今天的新闻传媒 / 陈小川
- 21 第三讲 我心中的穆青和新华社 / 张严平
- 35 第四讲 我国传媒的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 / 陈力丹
- 49 第五讲 社会变迁与广播电视产业的转型 / 胡正荣
- 60 第六讲 论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能力 / 张文木
- 94 第七讲 中国电视的数字化产业化生存 / 张海潮
- 101 第八讲 媒体的盈利模式与改革探索 / 卢小飞
- 111 第九讲 “三农”问题的背景 / 温铁军
- 126 第十讲 财经媒体的竞争策略——我任《上海证券报》社社长的  
亲身经历 / 严文斌

- 136 第十一讲 党报营销“三部曲” / 侯 军
- 154 第十二讲 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和思考——以出版行业为例 / 刘建生
- 164 第十三讲 新闻架构研究的兴起与误区 / 潘忠党
- 190 第十四讲 大众传媒时代的写作 / 格 非
- 212 第十五讲 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 祝建华
- 231 第十六讲 处于十字路口的世界公共广播电视 / 洪浚浩
- 243 编后记 / 杨 芳

## 第一讲

# 中国国情与新闻传播

主讲人：范敬宜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高级记者。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东北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等职务；198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1984年调任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4月被清华大学聘为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主要著作有《敬宜笔记》、《总编辑手记》等。

时间：2005年2月18日

主持人李彬：今天，我们请德高望重的范敬宜院长为大家开讲。范院长的情况就不用多介绍了，今天来听讲的阵势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不过，我还想说几句。我看到学院的BBS有一个帖子，题为“关注身边的大师”，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我们一般比较关注远方的大师，崇拜远方的大师，比如说德里达、哈贝马斯、亨廷顿，或者景仰那些已经逝去的、远古的大师，孔子、孟子、柏拉图，或者是梁实秋、王国维……而往往比较忽略我们身边的大师。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我记得林肯总统逝世的时候，马克思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发了一封有名的电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他是那么平凡、朴实，以至于直到他倒下以后，人们才发现他是一位伟人。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在其如诗如画的名作《白轮船》里，塑造了一个可爱的莫蒙爷爷，莫蒙爷爷说了很多大智若愚、耐人寻味的话。比如“你跟驴子没法说清楚它是一头驴子”；“先知不知道自己是先知，只有强盗才知道自己是强盗”等。

啰嗦这么多，无非是说我们确实经常忽略自己身边的大师，而范院长就是这样一位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大师。院长在同学们中的声望不用多讲，平日里大家

常常称他为“范爷爷”，甚至干脆简称“爷爷”。好了，下面就由我们的范爷爷开讲，欢迎！

范敬宜：同学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功课繁忙之余来听我的讲座，我很感动。来到新闻学院三年来，第一次有这么多、这么全的同学聚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兴奋。平时一门课最多二三十人，可是，今天有很多新面孔，有些同学可能认识我，但是我还不认识你们，不过，真的非常高兴。

在新学期开始之际，我们的学院举办这样一个系列讲座，我觉得很有意义。举办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讲座，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系统的学习。当然，这项工作也是在不断探索与尝试，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讲好，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帮助我们开拓视野，从宏观上了解一些关于新闻媒体的重大问题，同时可以弥补具体课程上的不足，广泛深入地了解问题。对于主讲人来说，我想也是一个整理自己思想的过程。

我没有料到第一讲由我来讲，也没料到是要讲中国的国情与新闻媒体，我感到题目非常大，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讲好的。李彬老师和我谈，为什么要你来讲呢，因为你平时经常强调做新闻工作的人一定要了解国情，但通常讲给小范围的人听，那么，应该用这个机会，让全院的同学都能了解你的指导思想和思路，所以我没有犹豫就接受了这项任务。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办学方向是“面向主流，培养高手”。为什么要“面向主流”？这是清华大学的地位所决定的。大家都知道，现今的新闻院校的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增长，2003年我们学院成立时，全国共有新闻院校200多个，现在已经超过500个。在林林总总的新闻院校中，清华大学作为全国一流学府，如果不能把对学生的培养方向放在为主流媒体服务，那就没有必要在这样一个更加倾向于理工科建设的学校中设立新闻学院。所以，清华大学的师资条件、办学定位要求我们，一定要为主流媒体服务。当然，并不仅限于像《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媒体，或者限于党和政府的“喉舌”才叫做“主流媒体”，而是说一种“高层次”的媒体，正如一些媒体并非官方，但是办得非常好、影响力很大。因此，在理解“主流”概念上外延很宽泛。因而，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有这样的起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高手”的含义。其实就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这也是根据我院优秀的师资队伍这一硬件条件来说的。而且学校的领导也非常重

视我们,甚至在国内的新闻宣传部门我们也得到了高度的重视,这也为我们“培养高手”创造了条件。那么,一定会有同学问“高手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这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解释。一般而言,业务应该很强,管理也应该很强,文笔也要很好……教科书上会标明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众多的因素当中,最重要的是把握大局。作为一个真正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文笔、外语、口才当然是重要的条件,但若要成为出类拔萃的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大局”。

“把握大局”首先要“了解国情”。纵观新闻史,凡是成为大家的都是对中国国情、世界时情了如指掌,这样才能够纵横捭阖、居高临下,站得高看得远,比如过去时代的王韬、梁启超、张季鸾、王芸生、邓拓,这些人物都是能对整个世界大局发言的。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都会把新闻工作者比喻成“瞭望者”,意思就是站在船头,观察风云变幻,知道航船应当如何行走,能够告诉人们国内、国外的环境如何,应按照何种路线去走。这个比喻很贴切:国家是一艘在海洋中航行的的大船,领导人是掌舵者,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瞭望者,负责观察形势,提供信息和警报。作为一个出色的新闻工作者,不仅仅是反映事实,而且要发出预警,发出信号。

所以,我还深深记得曾经的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常常轻车简从,跑到报社来,找很多记者谈心,让记者讲当下的舆论环境如何,老百姓在议论什么,对工作有什么意见……他说自己得到信息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政府业务部门,一个就是新闻记者。而且事实证明,往往新闻记者提供的事实更加真实与生动,为此,他非常重视新闻工作。而作为一个瞭望者,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研究和判断,需要使自己的思想跟得上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站在时代的前沿,进行正确的传播和引导。假如做新闻工作的人的思想不符合或者落后于客观的情况,就会很容易造成误导。新闻工作总的来说是一项政治工作。不仅仅在中国如此,在外国真正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都是政治家。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对形势非常的清楚。中央一直在强调要“讲政治”,要“政治家办报”,我想其意义就在这里。那么,现在也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这样做会变得教条,变得自上而下的死板,其实是这些人没有理解“政治家办报”的真正含义。

2004年,各个报纸都刊登了外交部长李肇星一次就中国外交和政策答中外记者问,整整一块版,作为部长答记者问可以做满一整版是绝对少有的。这是一次全国人大组织的中外记者会,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李肇星的回答也很出色,我们来看看这些记者都提了些什么问题。

新华社记者问道:“我们注意到在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个

重要的判断,他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的理解与信任,尊重和支持,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请问李部长,这个判断的现实依据是什么?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局的问题。

韩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说:“我有两个问题,第一,请问胡锦涛主席今年是否有访韩的计划?第二,近来进入中国的朝鲜难民数量增加,包括韩国驻华领事馆的一些外国驻华领事馆的正常业务受到了影响,请问出于人道主义,中国是否有接纳这些朝鲜难民的办法?”这也是政治问题。

塔斯社的记者问:“请问现在中俄关系如何?俄罗斯有了新的总理,中俄关系是否有所改变?”合众国社的记者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昨天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提到现在国际局势有一种单边主义的倾向,你能否就单边主义深谈一下?这是不是指美国?第二,现在中国把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中国在涉及人权方面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是不是与中国所加入的联合国公约时做出的承诺相吻合?”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问:“中国新一届政府执政已经一年,你认为在这一年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前些年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你是否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所持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加侧重于‘有所作为’,而不是‘韬光养晦’了?另一个问题是,请问你担任外长以来,感受最深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就此有感而写诗呢?”

李肇星这个同志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喜欢文学,看的文学书很多,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写诗、写散文,他的诗写得很不错;另一个特点是特别孝顺父母,他来自山东的普通农民家庭,每次出国回来都要先回家看父母,而且他的车都停在村子外面,不是说那种衣锦还乡的样子,而是怕父母不高兴,所以不摆阔气,考虑到了父母的感情。记得一次美联社的记者问他:“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长相有点遗憾?”李肇星回答:“我的母亲以我的容貌感到自豪。”使得那位记者无言以答,所以说他同时又是一个很风趣的人。

接着呢,日本东京记者提问:“日本和中国之间已经有两年没有首脑互访了,我理解是因为有历史问题和靖国神社的问题,什么情况下两国互访才有可能?另外最近中国有学者提出‘中日关系新思维’,中国外交部的思考是什么?在高速铁路问题上,日本一直希望能够采用新干线的技术,中方也已经表示过,会采用国际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具体的时间和方式究竟是什么?采用日本新干线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少?”

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都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李肇星的回答都很朴实、风趣。作为一个外交家,他胸怀全局,怀揣五洲风云;作为记者而言,这

种场合下绝不会提出鸡毛蒜皮的问题。

我当时在看现场直播的时候就在想,未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去的同学就应该是这样的记者,能够向外国领导人提出尖锐问题的人。其实,我知道中国领导人也是喜欢人家提出挑战性的问题。但现实情况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经常是问“请问总理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他说,看法都有了,还用我多说么。这个记者就是提不出问题的记者。所以,我认为记者的修养第一步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为纵览五洲风云,胸怀万家忧乐的人物。这才叫做政治家,不是空头政治家。要懂得政治,了解政治。要知道我们的国际环境、外交政策和对策。

从其中我又懂得了一点,什么是“审时度势”。新闻记者最大的特点应当表现在这里——审时度势。在新闻工作中,写作的技巧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要把握大局。把握大局就是要了解国情、世情,就是要审时度势。中国的古人也很重视审时度势。在成都的诸葛亮祠堂前有这样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上联是赞扬诸葛亮,下联是批评诸葛亮。这两联连在一起就是总结诸葛亮的得失。前面的意思就是说,诸葛亮懂得政治工作。打仗就是要“攻心”,从思想上瓦解敌人,“反侧自消”就是说各种矛盾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自古知兵非好战”,真正的政治家绝对不会好战,而是善于利用政治统领部队。下面则是在批评诸葛亮“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不能够审时度势、把握大局,甚至连小事情都要事必躬亲、不考虑大方向,那么,政策无论宽严都是错误的,因而将来治理四川的人一定要接受诸葛亮的教训啊。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生动,很适合用在新闻工作,特别是新闻工作的领导工作上。将来你们当中一定有人会从记者、编辑到总编辑再到台长、社长,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过去有一些人在宣传方面总是反复,就是因为不能很好地审时度势。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为此,我认为这个对联可以作为我们新闻工作的座右铭。

从一开始学新闻、做新闻时,就要开始研究大局。政策往往是如果把握不好平衡点,则宽也不行,严也不行,如何来把握这个平衡点,则是需要了解大局,心中有大局。《三国志》中有一段著名的《隆中对》,其中诸葛亮就讲到,天下三分的形势已经开始形成,劝刘备珍惜机会巩固三国态势。我曾经到隆中去过,很偏僻的地方,我就很奇怪,在当时的情况下,交通不便,也没有电视,诸葛亮怎么会了解天下大事?只能说这个人了不得,在信息闭塞的条件下,用心研究了周围的形势。《隆中对》一共 296 个字,就已经把道理说得非常完整,用很辩证的观点阐述

了即将出现的三国鼎立的情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所以说诸葛亮非常伟大,当然也引得湖北和河南相互争执“隆中”究竟在哪里,就是在争诸葛亮这个“品牌”。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吴官正同志在当湖北省委书记时,曾要求省里所有领导人人手一册《隆中对》,学习它观察形势,把握时局的特点。1999年成思危副委员长到湖北视察义务教育时,我也陪同前往。到襄樊的时候,其市委书记很有意思,其他人都在汇报很多关于经济的情况时,他说,希望副委员长能呼吁将《隆中对》放入中学教科书,因为在文革之前的中学课本中是有这篇文章的,而且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周围环境、判断行事都非常有好处。所以,我回来后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课文应收〈隆中对〉》,之后成思危把这篇文章转给了陈至立,陈至立进行了批示。到第二年情况发生了改变,教科书不再进行统一,交由各省自行决定。总之,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很多党的领导干部都很重视《隆中对》,很好地解读可以防止形而上学或者是机械唯物论的出现。

既然审时度势、把握大局如此之重要,究竟如何才能做到呢?把握大局对现在而言最关键的是要了解国情、民情,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人民群众现在是一种怎样的情况、怎样的心态?喜欢的、希望的是什么?不希望的是什么?我想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弄清楚了国情、民情,就好比有了一杆秤,把遇到的问题放在上面称一称,就能够预料到会发生什么,就能为判断新闻价值提供一个标准。

那么,我们的国情是什么?首先,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3亿的人口,是发展中国家,现在要实现全民小康。民情是现在老百姓基本的处境。富裕的人有多少,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小康的是什么样的人,下岗工人到底有多少,我知道的辽宁省的下岗工人非常多,生活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最近遇到了一个辽宁省刚刚退下的省委领导,特意和我说:“老范,你说的情况不对啊,昨天刚刚有省里的人打电话说,沈阳市一个下岗的也没有了。说现在有‘三个第一’……”我说:“我不喜欢听什么三个、四个第一,那是非常容易编造的。”到底听谁的呢?现在有些报道是假装困难的,但反过来说一个也没有的我想也有些过。我们说,决策来自于信心,信心来自于对情况的判断,情况的判断来自于对一个真实事件的了解,如果对情况不了解就做出决定,很容易造成“宽严皆误”。

回到民情上面,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分化差距大,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但是收入水平正在拉大,各地区发展也不平衡,而且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的问题。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希望能够富裕起来,希望国家能够稳定,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所以对我们这些同学来说,因为“不当家”,国

家的难处往往了解得很少。我们开始进入社会,从事新闻工作,最容易犯的就是片面性,只看到一方面而忘记了另一方面。

比方说,我经常打出租车,就是为了能多了解一些基层的老百姓的看法。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是“业余政治家”,特别能评价国家大事,什么都能评论,口气可大了,指点江山。比如那一次,九届人大,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我就问一个出租车司机:“怎么样,听了朱镕基答记者问了没有?”“听了。”我说:“怎么样?”他说:“我觉得他讲的还是那么回事。”接着又说了,“我看他呀,就像我这辆车似的,往前开没有好路,往后开又没有退路。”这两句话非常生动。后来有一次我见到朱镕基同志,我说听到了人家对你的评价,听过之后朱镕基同志眼泪马上就流下来。

他们对贫富差别的尖锐程度感受非常深。那个司机就说:“有的时候很多不同的人乘车,有的人钱多得难以想象,一次买了四五万块钱的东西居然还说没什么东西可买,我听了之后就想要是手里有把刀,真想把他们全都捅了。”可见贫富差距带来多大的效应,可是这只是一时舆情,在所有的人民群众当中应该说是占少数的,但也不可忽视。如果时间拖得太长,矛盾就可能被激化了,所以说,在当下而言,不要总认为就自己是救世主,能够代表人民群众,如果不了解大局,往往会把一些小事情、具体问题扩大化,对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年轻人很容易义愤,但是不知道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情况非常复杂,在这个情况下“当家”不容易。所以我们说,特别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特别是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胡锦涛同志说,新闻工作是要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如果不是这样,要求过激、过高,甚至一蹴而就,往往会适得其反。“八九政治风波”的情况就是如此,年轻的学生都是想推动民主化的进程,结果适得其反,所以这个问题认清楚之后就可以有比较实际的判断。去年温家宝总理接受《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唐尼采访,对方问他:“你对‘六·四’怎么看?”温家宝回答说:“作为中国的总理,我最关心的是中国的稳定和发展问题。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用乘法,一个小问题,乘以13亿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但如果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是一个很小的数目。”美国也只有3亿人而已,如果这样比较,我们的个体很容易不满足,这当然是不能比较的。所以,我们当记者的很容易产生一种偏见,美国能够做到这样子,日本能够做到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就做不到?为此,温家宝就说,这是很多外国人不能够理解的问题。这个回答就是依据我们现有的国情、民情来答的。

其实,不仅仅是外国人,很多国人也不理解。最基本的认识就是,对民情有所了解之后,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了解大局,写起新闻来总会觉得自己理亏。比如,我们经常会觉得对我们中国的新闻理亏,比如说喉舌的问题、导向的问题,其实也不能怪我们年轻的同志,主要是我们没能把这些东西说清楚。比方说喉舌的问题,大家会说,多难听啊,喉舌,就是鹦鹉学舌,但实际上这个词语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自古以来我们就把舆论称为喉舌。梁启超、王韬、孙中山都讲过“喉舌”。“喉舌”者无非就是代表一个国家、团体或者政党所发表的声音,但我们就会觉得很理亏。在课堂上,我讲到“喉舌”的问题时,下面同学尽管不反驳我,但是相视一笑,意思是“你看看又来这套东西了”。刚才我还在看,你们中间有没有偷偷笑的。其实,脸上没露出来,心里面想着:范敬宜又来这一套了。我觉得这是理直气壮的——总有代言人的。就像《共产党宣言》中讲到的:我们认为隐瞒自己观点是可耻的,必须把话实说了才行。另外从我们翻译上来看,也有问题,外国人没有与喉舌相对应的翻译,结果翻成了“organ”,人体器官,肝脏什么的。这说法也并不比我们的好听,“mouth and teeth”,嘴和牙齿,汉语言的特点就是用人体器官来指代某种概念。比如说,肺腑之言,写文章也要称作“眉目清楚”,“肌肤之亲”指代异性关系。所以,有些外国人就理解我们中国人甘愿做喉舌,不过现在很多中文很好的外国朋友的观念已经开始变化了。当然,外国人也不是故意歪曲,我觉得是语言间的差异造成的。外国人有些词汇翻译到中国也很奇怪,比如管爱人唤作“蜜糖”。所以说,观念不一样,习惯不一样,理解就不一样。所以说,肝胆相照、耳目一新、心腹大患等都是用身体器官来指代的。导向,怕的是脱离事实,强加于人。但实际上,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在导向中生存呢?《旅游指南》就是专门告诉我们路应该怎么走。人之初的时候就有导向:小孩儿,不能摸火、有坑要绕行,都是最简单的导向。大了之后,还要听老师的话、朋友的话、组织的话。导游都需要一面小黄旗,人们都紧跟其后,怕走丢了。导向无非就是让我们按照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行事。西方的“leader opinion”、“guide opinion”都是这个含义。

还有就是我们总觉得新闻框子太多,我也知道框子多。有的限制、纪律确实不让人满意。但是世界上不存在一点框子没有的新闻。其实,就像这所房子,就是一个框子,如果没有它,我们在外面零下几度会很冷。对于演员来说舞台就是框子。当然现在也有新的手法,跳到观众席中去表演。这是某一种规范,各国不同。关键不在于框子不框子,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本事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京剧大师盖叫天,武功特别好,甚至晚年还可以在一张

八仙桌底下打完一套猴拳,而且手脚不会碰到桌子的任何部位。这就是炉火纯青,“随心所欲不逾矩”。规矩本身也会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就整体而言,我们的舆论环境比先前宽松多了。但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呢?不是说所用的规定、要求都不存在了,我们才可以写东西。我一直在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在于如何找到正确的语言。没有不可写的,没有不可批评的。现在我们的宣传技巧和宣传艺术上存在很多问题。限制了我们的宣传技巧,按照更好的方式来妥善处理问题。

讲了这么多,终究是想说明几个问题:第一,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国度里、社会里,要时时刻刻研究怎样做行得通或者行不通。尽量去做行得通的,另一方面,不能因为某些事情行不通,碰了壁以后就放弃。

第二,对国情的了解应当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不仅要区别国内、国外,还要区别城市、乡村,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记者的职业决定其可以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方方面面的议论都要听到,对于社会生活的同一个现象,处于不同位置的人,看法往往会有分歧。那么我们怎么办?应该把坐船的人和看船的人分开对待,山里的和山外的分开对待。坐船的人,身在其中,往往不能感受到船在向前行驶,就像我们国家,一直在发展,大家却不停地抱怨:慢啊,慢啊。这时候需要回头看看,回头就会发现离开原来的出发点很远了,离前面的目的地越来越近。在船上你觉得很稳,似乎没有运动,但站在岸上的人已经觉得你走了很远。这时候回头才会发现原来离岸边很远了。看山也是这样子,苏东坡有句很有名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人在外面看山,都会觉得山势雄伟,特别有气派,外国人往往看中国就是如此。今天偶遇的法国人告诉我说,中国20年的发展超过了法国200年甚至300年间的发展。他们就是在远处看,我们国内人是在山里看,经常看到乱石滚滚,这里一个树杈子,那里一片荆棘丛生,走路磕磕绊绊,往往看到的是具体的、局部的。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身在其中和其外的感受差别巨大。作为新闻记者,既要做坐船的人,又要做看船的人;既要是一个山外人,又要是一个山中人。把两种视觉结合起来也许能够比较全面地看问题。既不是只看到庐山的雄伟,而看不到山上的乱草,也不是因为看到乱草而看不到它的雄伟。别人可以随意见论,不负责任;我们作为媒体、喉舌,一定要有正确的看法。

所以,我们要做两种人——山里人和山外人,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看到全局。把握好全局之后,才能抓住重大主题。比如说医疗问题,到底问题何在,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去研究。在大局的角度上,如果能够写出震动全国的文章,可以说是

有本事。有一些小报,往往仅仅指责或者揭露,甚至 30 多个版面打开后不是凶杀就是绑架,所以一些同学和我抱怨说,现在报纸上都是“绝望新闻”。过去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个著名电影演员李秀明,后来做生意跑到国外,回来后同我讲,中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她看了一些都市报,感到有些恐惧,她说自己的林肯车都不敢开出去。事实上,我们国家确实有这种问题,但还没有到开林肯车就会遭绑架的程度。所以,这就说明一个导向问题。导向,就是能够比较正确地分析问题,能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大的角度说,我想说审时度势把握大局有两个角度:一个是空间上的把握,一个是时间上的把握。空间上要求我们站得高,这样才能看得远。王之涣的诗里面写得好:“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杜甫的《望岳》中也写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般阅读时,我们都会将其列为风景感受,着眼于心胸视野的开阔,实际上也可以把它看作观察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是要站得高,从制高点看问题。刚才提到的李肇星答记者问,里面的提问、回答多是站在宏观角度,所以新闻工作者应该目光四射来把握整体局势,应该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从时间的角度把握大局,就是要求我们把历史和现状融汇贯通。许多新闻工作者都知道看问题离不开全局意识,但很多人讲的全局意识是仅限于空间的,就是把新闻放在一个广阔的空间高度来认识,可是人们往往忽略时间上的全局意识。所以,有人称其为“时盲”。很多事情都需要放在历史长河中考察,才能看到它的实际意义。仅仅考虑现在就很容易片面。

比如前年的 SARS,有人挑毛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从毛主席的时代就已经消灭了所有的传染病了么,这是割断历史看问题。我们不可能告别一个时代,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代表没有疾病,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重温旧闻知新闻》。讲的是邓拓不仅是新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年轻时就读于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论文是《中国救荒史》。荒包括灾荒和疾病,从商汤 20 年,一直写到 1936 年。四千多年的历史中,他找了很多资料将其排列,几乎没有哪个年代断过疾病,而且每次疾病的流行都会死去上万人。所以说新中国,政治上是全新的,疾病的病菌是不可能全部被消灭掉的,但由于长期宣传,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既无疾病又无灾害,一旦出了一点问题就会让人想不通。因为历史时代是分割不开的。而且在地域上,整个地球连在一起,外国有的东西一定会传到中国,中国不是真空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时会出现片面性,说我们的新闻欺骗老百姓,隐瞒了事实,其实我们很多人不了解,以前对于这种恶性疾病是绝对不会报道的。当时的形势所迫,卫生部部长也被撤销职务,实际上,过去连性病都不

能见报,更何况是艾滋病。马的口蹄疫在内蒙古时常发生,过去也不报道。所以我们的民众不能理解,反而讨伐卫生部门。以前抓得很严,不像现在放得如此之宽,艾滋病、性病现在电视里经常被播报,现在是一个开放的时代,讲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割断历史,包括对待疾病的态度。这样,既从空间上把握,又从时间上了解,一些东西就可以避免形而上学,避免忽左忽右。

那天在新闻文化课上,我也讲过很多东西要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讲,记得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什么都需要票证的时候,每个人30斤粮票,一家一个月1斤油票,鱼什么的平时吃不到,过节时每家发一点鱼票,物质匮乏,只有三个节日才能供应鱼:春节、国庆和中秋。当然现在物资丰富了,要把事件放入历史长河中,流动地看问题才有意义。还有一次课上一位同学问,文化是不是就在写新闻的时候多一点形容词?我说不是。大文化的含义很广泛,历史是其中尤其重要的一方面。作为记者应该具备一定的历史修养,懂得从历史的高度看待新闻事实。

所以,新闻工作者做到审时度势把握大局,从方法上说,既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又有历史学家的纵观古今,新闻史上出现的各种大师都是在政治和文化上有很大的修养。正如邓拓,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政治家,很容易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审时度势,对未来的发展做出预见;再比如梁启超,本身没有学过新闻专业,那个时候国外的新闻理论还没有传入中国,但他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所以他写的文章往往具有前瞻性,而且纵横捭阖,挥洒自如,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所以,我建议大家看看新近出版的《梁启超文集》。这本书一泻千里的感觉看得人怦然心动。

关于审时度势把握大局讲了很多,当然不是上过课就可以做得到,还需要到实践中体会。我简单讲两条自己的经验:第一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看报、看《新闻联播》,我们国家发生了哪些大的事情,走向是怎样的,必须每天积累每天看,时间不会花费很多,不要说报纸不好看就不看,《新闻联播》不好看就转台。这个不算本事。李希光老师和我讲,《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说,中国报纸办得最好的、必须看的还是《人民日报》。问题是你们的普通群众没有时间,或者不愿意花费时间看。他说,只有我看了以后,才会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中国有句话叫做“字里行间”,外国人不太明白,我专门雇了一个人,每天把《人民日报》重要信息读给我听。我觉得人们不是没时间看,是不愿意看,觉得太硬了。但别人可以,做新闻工作的人不可以。不像看《××晚报》,列个标题或者导语——专业上叫做“立电线杆子”,而《人民日报》的任务是要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解读。对于大家未来求职就业的应试,也是有重要意义。

第二是注意身边的舆情。直到现在我身上总是会带着纸和笔,走到哪里记到哪里,光是的哥的话我就积累了好多。很多都写入了文章,非常有意思。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安于做个老头儿》。有一天我坐出租车回家,到院门口的时候,司机看看我,我穿得很简单,他又看看院子,是部长的院子,说:“老师傅,您家就在这儿住?”我说:“是啊。”他说:“哦,我明白了。你过去是个头儿,现在是个老头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差一个字,完全两个层次了。我的文章写的意思是,我们往往是老头儿了,还不安于做老头儿,指手画脚,干预现在年轻的同志工作。所以,应该做一个健康的老头儿,快乐的老头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一个有所作为的老头儿。我自己也有所自勉。

这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什么联系呢?我想最根本的就是实事求是,必须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所处的国情、所处的形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如何去把握好方向。你们还没有到社会上去,不工作不会有体会,做了之后会有想法。

(曲元整理)